



# 多元视野下的古民居研究

——张掖古民居解读

冯星宇◎著

AR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 多元视野下的古民居研究

——张掖古民居解读

冯星宇◎著

AP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多元视野下的古民居研究：张掖古民居解读 / 冯星宇著. -- 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4  
ISBN 978-7-5699-0870-1

I. ①多… II. ①冯… III. ①民居—古建筑—介绍—张掖市 IV. ①K928.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5749 号

# 多元视野下的古民居研究——张掖古民居解读

著 者 | 冯星宇

出 版 人 | 杨红卫

选题策划 | 席建海

责任编辑 | 王 水

责任校对 | 尚 蕾

装帧设计 | 宗彦辉

责任印制 | 刘 银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100011 电话：010-64267120 64267397

印 刷 |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695×995mm 1/16

印 张 | 12

字 数 | 180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0870-1

定 价 | 3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目 录

- 引 言 / 1
- 第一章 传统文化视域下的河西走廊民居 / 27
- 第二章 装饰艺术视域下的张掖古民居 / 34
- 第三章 建筑艺术视野下的张掖古民居 / 56
- 第四章 生态视野下的河西走廊民居 / 70
- 第五章 民俗文化语境下的张掖古民居 / 82
- 第六章 旅游产业背景下的张掖古民居 / 88
- 第七章 家族文化语境下的张掖民居 / 101
- 第八章 地域文化视角下的张掖古民居 / 107
- 第九章 多元文化视角下的张掖古民居 / 120
- 第十章 张掖古民居（大院）口述记录 / 126
- 结 语 / 156
- 附 录 张掖古民居的调查报告 / 159
- 参考文献 / 183

# 引 言

民居无疑是开始最早，分布最广的一种建筑形式。《易·系辞》中载“上古穴居而野处”，《礼记》中的“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都是对上古之人居住活动的描述。不论是营窟或是筑巢，都是建造活动的起始，其建造的目的只是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一个可以遮风雨、避野兽的场所。我国地域辽阔，自然地理，南北东西，各有不同，因而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民居建筑。传统民居的特征在建筑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① 平面布局和环境特征。它是社会制度、家庭组织、习俗信仰和生产生活方式在民居中的体现。

② 结构和外形特征。它映了气候、地理和材料、构造技术等对建筑的影响。

③ 装饰装修和细部特征。它是文化、习俗和审美意识在民居建筑内部和外观艺术上的表现。

中国传统民居根植于流传几千年的农耕文化，代表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极富人情味和地方特色。这些形式各异、瑰丽多姿的民居建筑，是我国古代建筑遗产中的一份宝贵财富，

也是当今建造新民居时可资借鉴的源泉。传统民居的形成与社会、文化、习俗等有关，又受到气候、地理等自然条件影响。中国土地辽阔，人口众多，由于各地气候悬殊，地理条件不同，材料资源又有很大差别，加上各民族不同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审美要求，造成传统民居的平面布局、结构方式、立面外观和内外空间处理也不相同，使得中国民居建筑具有鲜明、丰富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性。例如：在封建社会，血缘、亲缘、家族体系和农业生产方式决定了汉族人的家庭组织及其生活方式，在传统民居中就出现院落式布局方式，我国汉族民居大多属于此类布局方式。但是由于南北气候的悬殊，东西地理的差异，在北方干寒地区形成的是合院式民居，在南方湿热地区就形成天井式民居，在中原黄土地带形成的是窑洞民居，在沿海多台风和内陆多地震地区则形成穿斗式民居。

人们在实践中所创造的技术和艺术处理经验，如民居建筑的通风、防热、防寒、防水、防潮、防台风、防虫、防震等方面的做法，民居建筑结合山水、地形的做法，民居建筑装饰装修处理等，在今天仍有实用和参考价值，值得探索。中国传统民居建筑与社会、历史、文化、民族民俗有关，与儒礼、道学、阴阳五行等思想也有密切关系。例如：在家庭制度盛行的农村，聚族而居的现象非常普遍，民居与家庙、祠堂布局一起。古代盛行的天命观、家族观、等级观和阴阳五行思想，对民居的选址、择位、定向、布局以及建筑的正面、大门、山墙、墙尖屋脊、装饰装修等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本书结合历史、地理、社会、风俗、文化等方面的因素，探讨它们与传统民居之间的互动关系。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东段的主要干线，汉唐时期，东西方文化通过战争、宗教和商贸等渠道交汇于此，对其地域文化特征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河西走廊的建筑蕴含了异质文化碰撞、交汇的成果，是探讨中外建筑文化交流的典范。河西

走廊建筑包括塞防建筑、民居建筑、佛教石窟、寺庙等。

自汉武帝开辟“河西四郡”以来，生活在河西走廊上的人们，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共同发展、相互融合，促进了区域文化的形成，多种文化景观形成了丰富的河西走廊文化。历史转入明清时期，河西地区转变为一个特定文化区域，在长时期稳定的社会环境中逐步发展、完善和成熟，其文化景观表现出在本地自然环境的基础上，以中原农耕文明为代表的移民文化与河西走廊西边的地域文化相互交流融合为主，兼具其他多元文化的影响。河西建筑也在多种文化因子交织影响的基础之上构成了地域性特色。河西地区的自然环境是河西建筑发展的背景，河西地区绿洲农业环境中十分重视水利资源的利用，工程地质条件下发展出的建筑措施以及以土为材的河西地区民居形式，都是自然环境在建筑上的最直接反映。此外，出于保护自身安全和适应自然环境的目的，河西人民采用军事聚落的演变产物堡寨作为其重要的聚落形式。明清统治者对河西走廊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屯垦，中原建筑持续影响，在嫁接到河西地区的同时，其功能、用途也伴随着区位的不同发生着改变，形成了适应其地域特征而不断丰富的河西建筑。河西的祠庙建筑更多地发挥了化解用水纠纷、缓和民族矛盾、维护地方稳定的作用。河西建筑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受到多种民族文化相互影响，广泛吸收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等多种建筑文化的特征，构成河西建筑的特色，河西建筑景观也因此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景象。河西建筑因服务于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现实作用，自身的创造力不断发挥，使得河西建筑在建造方法上表现出异常丰富的形态。随着河西文化的稳定与发展，明清时期的河西建筑也出现了与关中建筑及中原建筑相区别的本地化建筑特征和建造方法，如装饰性与结构性相统一的檐下处理方式、弧腹向上的三件套角梁做法、抹角梁法的屋面支撑结构，并且在清代中后期，河西地区逐渐发展出一套相对独立的河西建筑工艺体系。而河西走廊与邻近的宁夏地区通过沟通两者的宁武商

路，由地理位置的接近和人员的流动形成了两个地域间较为一致的建筑特征。此外，河西建筑的特征还沿黑河北上影响至内蒙古额济纳旗，并自张掖起北行越人祖山辐射到阿拉善等蒙古西部地区。清乾隆后期，大批河西军民迁移到天山南北驻防屯田，致使河西建筑工艺传统也被带到了新疆天山沿线地区，一直抵达边境的伊犁州，产生出用“宏观河西建筑”的视野审视超越河西地域本身的建筑工艺的影响，在河西文化的基础上，构建具有地域特色和不断向外辐射的河西建筑文化范畴。

已有研究成果概述。一是河西建筑的研究，包括河西走廊长城、关隘、烽燧等军事防御建筑在形制、构造技术等方面的整理和研究。以石窟壁画中所反映的建筑形象为主的敦煌建筑研究。对宗教等公共建筑的个案研究和河西走廊建筑工艺做法的收集和整理。从生态视野出发，对河西走廊夏热冬冷、干旱多风沙气候条件下居住建筑的发展研究。有关河西建筑的研究往往专注于单体建筑或建筑组群，如罗哲文在《临洮秦长城、敦煌玉门关、酒泉嘉峪关勘查简记》中对嘉峪关的城楼等建筑曾做过简要记录；如景爱的《中国长城史》中对河西地区的长城做过全面概述；孙毅华、孙儒在《敦煌石窟全集石窟建筑卷》中，对敦煌莫高窟现存的一些窟檐、牌楼和寺庙建筑做了细致的介绍；宿白在《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所辑的两篇论文中曾对武威、张掖的藏传佛教寺院进行了研究；王巍的《河西走廊地区寨堡建筑》探讨了河西地区私人寨堡民勤瑞安堡的建筑空间形态及其建筑特色。对河西建筑各类型的考察，通常包括在对甘肃全省或更大范围建筑文化的叙述过程中，虽然河西各类型建筑都有所涵盖，但毕竟数量不多，如唐晓军、师彦灵的《古代建筑》涉及甘肃的王府、衙署、宗教建筑、民居等类型，河西地区的许多建筑也包括在内，但笔墨有限；李焰平等主编的《甘肃窟塔寺庙》一书虽然很全面地汇集了甘肃各地大量石窟、古塔、寺庙的资料，河西建筑也有不少入选，但不足



之处是对建筑物的建造年代、木构形式均缺乏准确考订，仅作描述。因此，以往的研究大多限于历史文献的考证或单体、单组建筑或某种类型的描述性介绍，而缺乏整体的宏观把握。王军的《西北民居》，将河西走廊民居作为西北民居的组成部分而略作叙述，提到了河西走廊的民居布局及建筑技术。对于河西城镇建设的关注，有马鸿良、酃桂芬《中国甘肃河西走廊文化名城与重镇》对于早期河西走廊聚落、古城的演化、地理分布、城址年代等问题的大量研究。19 纪后半叶至 20 世纪初，中外人士对河西走廊进行了大量的考察，留下了较多的文献和影像资料，可以弥补当今建筑资料的缺失，但这些资料至今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书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明清河西走廊民居建筑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整理。

二是河西走廊城镇的形成、规模形制以及城镇建设方面的研究。段智君的博士论文《明代北边卫所城市平面形态与主要建筑规模研究》研究了明代卫所城市的有关建成结果和营建規制，其中包括河西城镇的规模尺度、建设情况，并做了深入分析；陈菁的《试论河西走廊古代城镇建筑研究的视角与方法》提出整合多学科研究方法拓展河西走廊古城镇建设的研究，拟定了可借鉴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自然环境影响下的河西建筑研究，有戚欢月的《敦煌荒漠化地区民居浅析》，根据民居形式与气候间的依存关系，总结出敦煌荒漠化地区民居建设的特点；李延俊的《河西走廊张掖小满镇传统生土民居实例探析》，揭示出河西地区传统生土民居的生态性特征。这些丰富的研究成果，均为本研究不可缺少的基础，也是本研究得以完成的保障。对明清时期河西走廊建筑的研究首先建立在其所处的中国西北甘青地区宏观调研基础之上。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今，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结合教学与科研活动相继对河西走廊及所在的甘青地区多处现存明清重要文物建筑进行了测绘，通过测绘，取得了大量的图像及数据资料，并随之对其展开了修缮设计、保护规划和其他研究工作，此外，在近

二十年对甘青地区和河西走廊传统建筑的持续关注过程中，天津大学的师生通过现场考察，收集到了分布在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陕西等西北省区的众多相关传统建筑的文献、影像和数据信息，为河西建筑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资料。在学术研究方面，1994年，吴葱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青海乐都瞿昙寺建筑研究》，2001年，“甘青地区传统建筑及其保护研究”专项研究课题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随着基础资料的积累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已取得一定的阶段性成果；2004年，唐栩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甘青地区传统建筑工艺特色初探》，此后，甘青课题又将建筑遗存的个案研究与各类建筑工艺专题相结合展开研究；2005年，程静微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衙门及妙因寺建筑研究——兼论河湟地区明清建筑特征及河州砖雕》；2011年，段智君出版了学位论文《明代北边卫所城市平面形态与主要建筑规模研究》；2006年，陈菁的《试论河西走廊古代城镇建筑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发表于《兰州理工大学学报》；2004年，戚欢月的《敦煌荒漠化地区民居浅析》发表于《建筑学报》；2009年，李延俊的《河西走廊张掖小满镇传统生土民居实例探析》发表于《山西建筑》；2004年，唐栩出版了学位论文《甘青地区传统建筑工艺特色初探》；2005年，程静微出版了学位论文《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衙门及妙因寺建筑研究——兼论河湟地区明清建筑特征及河州砖雕》。

河西走廊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各种特点，很早以前就引起了外部世界的注意和兴趣，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国门的洞开，欧洲及其他地区的一些商人、军官、传教士、学者相继来到河西走廊所在的广大西北地区，进行了各种名义的探险、考察，他们通过著述和摄影、测绘技术为河西走廊留下了丰富的文献和影像资料，通过这些资料可以开展对很多已不复存在建筑的研究。2012年，天津大学李江的博士学位论文《明清时期河西走廊建筑研究》较为系统全面地研究了明清时期河

西走廊各种建筑类型。

河西走廊地区自古就处在丝绸之路即中西文化交流的要道上，多种宗教在此汇聚，多元文化共生，形成了灿烂的河西文化，而对河西建筑的研究构成了河西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以来，在适应河西走廊地区的地理条件和文化背景下，河西走廊建筑在类型、结构、构造、选址、布局、形制、装饰和审美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建筑特征，并发展出了相对独立的工艺体系。因此，有必要开展对河西走廊建筑更为深入的研究。截至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河西走廊建筑实例个案、大木工艺特征、聚落形式、城镇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具备了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研究所需的前期条件。

由于学术研究力量分布不均，以及西部经济、科技、文化力量的自身限制，以往关于河西走廊地区传统建筑的研究工作多限于一般考察或局部研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不够；有关河西走廊建筑发展沿革以及历史时期地域建筑文化变迁的系统论述缺乏，对整个河西地区建筑的宏观整体认识还未建立起来，这与河西走廊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与北方、中原及江南地区传统建筑的研究进展相比，学术空白比比皆是。

以上是河西走廊包括张掖在内建筑研究方面的成果，虽然成果偏少，但也证明国内学者已着手进行研究。河西走廊地区自东向西绵延两千余里，城镇村落星罗棋布，在两千余年的文明史中所遗古迹甚多。在本地区的建筑历史研究领域，学界的侧重点主要放在明代以前的城市遗址、建筑遗物以及石窟寺中有建筑内容的壁画上，而举凡河西现存的唐宋木构建筑实物，仅敦煌的一塔五窟檐。但是，对于本地区仍然保留着的大量明、清、民国建筑，以往研究大多限于历史文献的考证或单个、单组建筑的描述性介绍，而缺乏整体的宏观把握和特色建造工艺的探究，仍有许多未知领域尚待探索，对构建区域建筑文化研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诸多方面可以填补空白。对河西走廊建

筑的研究，可以为文物古建筑修缮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使传统建筑文化得到很好的发扬，重现光彩。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甘肃张掖大佛寺及山西会馆、甘肃山丹峡口过街楼的修缮设计、武威文庙保护规划的过程中，以河西走廊建筑研究成果作为基础，为这些文物保护单位的价值评估、修缮保护提供了大量的参考依据。此外，2006年8月，中国与中亚各国已举行了启动丝绸之路跨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会议。作为人类著名的文化线路，丝绸之路沿途分布着大量的古代建筑。而河西走廊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的中国段，对河西走廊建筑进行研究则可以反映出其所具有的文化价值，获得文化遗产标准的认同，对于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总之，本课题的意义即是加强对中国河西走廊地区传统建筑的基础研究，强化其在保护、修缮、规划方面的成果转化，进行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对策研究，着力于传统的考古学科、建筑学科、历史学科之间的交叉，注重河西走廊建筑发展沿革以及各历史时期地域建筑变迁，建立整个河西地区建筑的宏观整体认识，开展与河西走廊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相称的传统建筑文化研究。

河西走廊遗留了大量木构建筑实物，其历史跨越从晚唐至民国，它们为研究河西走廊建筑的特点、形式、格局及其发展演化提供了重要实例与实物遗存。

有关河西走廊建筑的历史文献资料主要保存在各地志书、碑刻题记及中外旅行者的游记之中，这些河西建筑文献资料主要有：《陕西通志》《重刊甘镇志》《甘肃通志》《甘州府志》《五凉全志》《敦煌县志》《镇番县志》等志书，《凉州卫儒学记》《重修凉州卫儒学记》等碑刻，以及建筑梁檩等构件上的纪年、题记等。河西走廊所在的西北地区在历史上东西交流者往来频繁，不少人写下翔实的游记，从法显、玄奘到元代的耶律楚材、乌古孙仲端、常德、列班扫马等，他们的著作对于西北诸地道里、山川、物产、民俗的记载，都是研究西北

历史的宝贵资料。而西来者被西北地区拥有的悠久历史、特殊地理位置和各种特点所吸引，许多外国人都是经过这一地域开启或者深化了对中国的认识之旅，同时，他们留下的文字、影像、图表等资料，为我们了解同一时期的河西走廊打开了一扇视窗。蒙元时期，欧洲人来中国并著有游记者，主要有意大利人约翰·普兰诺·加宾尼（John of Plano Carpini, 1180—1252），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鄂多立克（Friar Odoric, 1265—1331），法国人威廉·鲁不鲁乞（willian of Rubruck）。约翰·普兰诺·加宾尼接受教皇使命，于1245年4月带着罗马教皇给蒙古大汗的信件，率领使团出使蒙古；鲁不鲁乞是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派往蒙古汉庭的使者，于1253年5月从君士坦丁堡出发，鲁不鲁乞凭借自己渊博的知识和详细的考察，将旅途见闻写成报告呈报给路易九世，留下了著名的《鲁不鲁乞东游记》；鄂多立克于1321年由海路抵达中国，从广州登岸，在大都居住三年，取道河套，经陕西、甘肃回国。回到意大利后将游历见闻修改而成《鄂多立克东游录》。在来华的外国人当中，最知名的算是马可·波罗。1271年，马可·波罗父子、叔侄三人来到中国，留居17年，他先后巡视到过陕西、山西、甘肃、四川等地，他对于元代中国情况的记载很有价值，对各地风土人情、物产资源及城市建筑都写得详细。著名的《马可·波罗行记》是一部旅行见闻式的游记，其中记录了有关河西走廊城池的情况。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和波斯国王沙哈鲁之间相互遣使，其中一队波斯使者1419年11月离开哈烈都城经过中亚，进入河西走廊出使中国，于1422年8月返回，共计两年十个月零五天。出使队伍中的画师盖耶速丁用日记的形式写下《沙哈鲁遣使中国记》，记录了出使的过程，对进入中国的第一站河西走廊有着重的记载。这些游记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河西走廊社会环境、建筑情况开启了另一视点。晚清民国时期，由于西北的自然和政治危机不断，西北经营往往受他国之干涉，一些西方国家试图插手中国西

北事务,《马可·波罗行记》:“抵一别州,名曰肃州,境内有环以墙垣之城村不少,而其要城即名肃州。”甘州(Campicion)城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市,位于唐古忒州境内,是唐古忒州的都会,所以它是该州境内最大而且最重要的城市。当地的居民主要是偶像教徒、回教徒和基督教徒。基督徒在甘州城有三座壮丽的教堂。依照风俗,偶像教徒有不少庙宇,其内供奉着很多偶像的塑像,最大的高有十步,其他的塑像都比较小;这些塑像有泥塑、木雕、石刻,制作工艺精湛,塑像外表镀有一层金,诸像周围有数尊极大的塑像,其姿势似乎是在向偶像的塑像行礼。

明清时期河西地区城镇的整体格局和建筑遗物能够保存至今的并不算多,由于时代的变迁,很多建筑实物又历经了修缮和迁建,往往原貌难以追寻,这就对河西建筑的研究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虽然涉及河西建筑的非实体资料,包括文献、舆图有所留存,但仍弥补不了三维图像的缺乏。缺少直观的认识,而通过考察和留下的历史照片,则可以成为形象缺失的有力补充,在无其他文献记载和图像传世的条件下,历史照片则成为最能证明河西建筑历史原貌的直接依据。目前,对河西建筑历史照片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历史照片在研究中的应用也处于图片展示的初级阶段。

在文化交流背景下进行的河西走廊传统建筑研究,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课题,需要在广泛吸收地理、历史、考古领域研究成果的同时,构筑特定历史阶段整个区域建筑技术与艺术的发展图景,探求在特定自然历史条件和文化影响下的地域建筑文化变迁。对于河西走廊建筑的深入研究,须建立在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的基础上。河西走廊现存为数较多的建筑实物,主要为明清时期的宗教建筑,为开展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实物基础;文献资料则主要集中在各地方志、碑刻和游记中,对河西走廊的建筑有些叙述,但若想在河西走廊古代建筑研究方面有所进展,必须在研究视角、对象及研究理论等方面另辟

蹊径。

运用实物测绘与文献研究相结合，实地调研与走访工匠相结合，理论研究 with 个案支持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参考历史、宗教、文化等各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构建区域建筑文化和建筑工艺研究的方法体系。实地调研可以获得直观体验，获取影像资料，实物测绘则可以得到比较全面、准确的结果，因而实地调研和实物测绘成为研究中所采用的重要方法。

河西走廊位于甘肃省西部，东起永登县乌鞘岭，西至敦煌市玉门关，地处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之交，南北位于南部的祁连山和阿尔金山与北部的马鬃山、合黎山和龙首山之间，长一千余公里，宽数十公里至近百公里不等，为东南至西北走向的狭长地带，形如一条走廊，又因之位于黄河“几”字形拐弯以西，故称为河西走廊。河西走廊在地域上大体涵盖历史上的“河西四郡”：武威（古称凉州）、张掖（古称甘州）、酒泉（古称肃州）和敦煌（古称沙州）。自汉朝汉武帝开辟河西以来，河西走廊因其占据的重要地理位置，成为连接西域的重要通道，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是古代中国同西域以及西方世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国际通道。

河西走廊气候干旱，有水之处可成沃野，无水之地便是戈壁。人口几乎全部集中于灌溉沃野之内，此外绝少人烟。河西走廊的地形以祁连山为其主干，东部的支脉乌鞘岭海拔达三千米，岭南之水汇于黄河，岭北之水没入沙漠，是河西走廊和黄土高原的天然分界线。河西走廊全区又可以嘉峪关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自古浪至酒泉，约长五百公里，祁连山耸峙于南，海拔多在四千米以上，合黎山屏障于北，海拔在三千米左右，其间平地低落，海拔平均不过一千五百米，因附近地势高低悬殊，地层不稳，故多地震并易发生灾害。河西走廊平地的广狭在于南北两山的分合，武威、张掖附近平地最宽，前者达到七十公里，后者为五十公里，山丹、永昌之间，南北两山最为接

近，其间几乎没有平地存在。山丹大马营草滩，海拔两千三百米左右，地高气寒，为河西走廊中的局部高原。嘉峪关以西地势比较开阔，马鬃山耸峙于北，与祁连山约略平行，中间平地更低，疏勒河西流至甘新交界处，中游谷地海拔不及一千米。两侧山地下注的河流，除党河等较大河流外，其余不得纳入疏勒河主流，而皆中途消没于沙漠之中。河西走廊除少数沃野外，均为荒漠。荒漠大致可分为三种，一为石砾满地，平铺坚实，寸草不生；二为平铺砂碱，而有碱草簇生；三为沙丘连绵。大致关内一带，流沙较少，关外风劲沙转，沙丘累累。河西山脉以祁连山为重要，合黎山次之。祁连山因位于走廊南边，故又名南山，合黎山因在祁连山之北，故有北山之称，二者相互平行。整个祁连山，实际上由一组平行山脉所构成，取西北至东南的走向，主脉绵延于青海省边界之上，长约一千公里，主峰在酒泉之南，海拔达五千九百二十五米，巍峨插云，皑皑白雪；东至武威、永昌以南，高度减至海拔五千米以下；武威以东山势更低，古浪南部的乌鞘岭，最高峰仅有三千米。但酒泉以西，祁连山的峰势仍峻，直至敦煌境内，峰势稍减，海拔减至四千米以下。祁连山因雄伟高峻，超越艰难，唯河川断山流出之处，有险要山口可以旅行来往，山口的高度多在三千米左右，如洪水河上游的扁都口仅有二千七百米，山丹河上游的白崖口海拔三千二百米，郭水上游的五龙口海波二千八百米。其中尤以扁都口最易通行，为河西走廊至青海的捷径。河西走廊地处亚洲大陆腹地，距离海洋比较遥远。走廊四周又有祁连山、合黎山、乌鞘岭等山脉阻隔，携带有暖湿气流的海洋气候难以深入，使得河西走廊雨水稀少、气候极端，大陆性气候极为显著，冬季严寒而夏天炎热。

水源对于河西极为重要，甘州总兵郭登的《龙首潭》有“愿作天瓢敷塞北，遐边陇亩庆全收”，表达出作者面对天旱心急如焚，希望自己变为巨大的水瓢，向干旱的塞北泼洒甘霖，使土地获得丰收的愿



望。水对河西地区有着特殊的意义，有水就有粮，有粮群众才能安居乐业，军队也可安心地保境安民。面对着干旱少雨的气候环境，水利维系着河西走廊的生存，伴随水利建设而在河西地区沿沟渠广设专门供奉龙王的庙宇也从一方面说明河西人民对于水资源的重视，从而重视龙王庙的建设。这种情况皆因河西地处边疆，其生存发展的第一要务在于屯田，屯田的兴旺与否与水利关系密切，而人们提起水利，马上会联想到主管它的神祇——龙王，自然对龙王庙的建设十分慎重。从民国时期《新修张掖县志》可以看出，城隍庙作为供奉一方的保护神，在人民心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中龙王庙与城隍庙相比，等级、院落都要更高，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龙王庙的地位。清乾隆《甘州府志》有对龙王庙设置的记载，张掖龙王庙建筑始自西夏乾佑七年二月间，分为上、中、下等处，明清两代屡次重修。其中提到的多座龙王庙中，上龙王庙在张掖县城西南八十里，张掖黑河水出峡口泾流处。“旧名河渎神庙，前有水峡，口小出大，莫测深浅。”西夏时建，历久倾圮，明代巡抚杨博重建，清代乾隆二十四年张掖知县王廷赞重修正殿，增建山门、寝殿、廊房，献“甘民衣食源”五字匾额，拨给龙首渠等处荒田六顷，作为龙王庙香火，维持日常开销。中龙王庙在张掖县城西三十里，西夏时建，元末毁，明洪武嘉靖年间屡次修缮，清康熙八年靖逆侯张勇重修。下龙王庙在张掖县城西十余里，西夏主李仁孝敕建，元末庙宇毁，明洪武中重建，嘉靖二十七年，巡抚杨博有祈雨文碑记，清康熙四十年重修，提督王进泰献匾额。民国期间的考察笔记《河西见闻录》中也有对这些龙王庙的记载：“出县城（张掖）东门，向东一直走去，穿过许多村庄和田园，在水渠灌溉之间，几座龙王庙也分布其中，我心里很确定这是一块肥美的土地。”这些祭祀建筑满足了人民心理上的诉求，每逢风雨失调，久旱无水，民众便到龙王庙烧香祈愿，以求龙王治水，风调雨顺。在许多的堡寨中，一般设置的庙宇有三官殿、文昌阁、牛王庙、关帝庙等，龙王庙通常